

、 研判報告

壹、 政治

葉非比

胡錦濤「七一」講話重申「立黨為公，執政為民」，闡釋新領導層以民為本理念，係「三個代表」的繼承與發展。指出民心向背決定黨與政權之盛衰。

胡、溫因應 SARS 疫情重大挑戰，樹立親民、務實、儉約施政風格，加大反腐倡廉力度，權力基礎逐步穩固。

胡、江「權力雙軌制」呈現拉鋸，黨軍二元結構矛盾浮現。惟為維繫政權穩定，中共高層呈現競合關係。

SARS 凸顯大陸當局行政效率不彰、訊息不透明、醫療資源不足、中央地方乏協調、官僚顛頂心態、幹群關係疏離等體制積弊。

SARS 引致體制內外學者活躍建言。政治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責任政治、黨政關係、決策民主化、輿論監督機制、社會開放等議題浮上檯面。

因應市場化競爭需求，大陸當局醞釀系列新聞出版管理制度變革。惟仍堅持引導及控制輿論，多家報刊近遭整頓。

2003 年 4 至 6 月大陸整體政治情勢波濤起伏。SARS 危機為胡、溫上任以來面對的第一個重大政治考驗，大陸當局警覺政制缺陷，建構緊急應變體制、撤換防疫不力官員、改善工作作風、有限度開放輿論報導。胡錦濤出任中央財經、外事、對臺領導小組組長，跨足軍事領域，成功進行首度外訪，權威及聲望持續上升。逐步推進偏向行政改革之政治改革，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三定」(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方案，進行權力制約監督試點，政務公開領導小組召開首次會議。學習貫徹「三個代表」思想新高潮成為當前首要政治運動，江澤民試圖延續影響力。

以下謹從大陸政情穩定及不穩定兩面因素簡析大陸政治情勢現況：

大陸政情穩定的正面（有利）因素

一、胡、溫權力基礎逐步鞏固

胡、溫開明處理 SARS 危機，政治資產上升

3月「兩會」期間，中共高層已察覺 SARS 疫情，惟並未公開提及。待疫情持續擴散，4月2日溫家寶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承認問題嚴重並採取緊急措施。胡、溫於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後，旋即積極部署防堵事宜，頻赴地方考察，展現防疫決心，民間聲望上升。4月23日溫家寶決定成立國務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揮部，吳儀任總指揮。中共並積極進行國際防疫合作，挽救國際形象。4月29日溫家寶並赴泰國曼谷參加與東盟10國領導人特別會議，商定就防治「非典」開展合作。

在具體行政措施上，5月9日國務院公布「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規定由國家建立統一的突發事件預防控制體系（將於國務院下設全國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理指揮部），重大衛生事件接報後1小時內，必須上報國務院主管部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則於5月14日公布「關於辦理妨害預防、控制突發傳染病疫情等災害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新華社，2003.5.14）。

4月20日中共高層宣布撤換北京市長孟學農、衛生部長張文康。迄5月15日，共有740餘名中央和地方官員（遍及17個省、市、自治區），因防治SARS不力而受到懲處（中共中組部官員統計。聯合報，2003.5.25，A13版）。人數之多、範圍之廣，係「六四」以來首次，對中共政治體制及官場文化具長遠影響。

整體而言，胡、溫積極公開處理疫情的態度，廣獲海內外好評。大陸媒體報導疫情的速度、深入、詳細程度，令民眾甚感驚奇（香港經濟日報，2003.5.28）。文匯報指出胡溫百日執政已贏得「二老」（老百姓及老同志）滿意（文匯報，2003.6.23）。胡、溫的治理作風亦影響中層官員，多位市長開始主動讓公眾了解其施政目標，以獲取支持（The Straits Times，2003.7.3）。SARS危機予胡溫迅速鞏固權力的機會，走出自身執政風格（香港信報，2003.6.4），並帶來資訊改革、政府行政文化改革及責任政治契機。有分析家認為彼等控制局面的速度比預期快，擺脫剛上任時之弱勢形象，表現決策自主，令外界對其執政能力刮目相看，可謂基本通過此一重大政治考驗，政治威望逐步升高。不少分析家亦指出，隨著胡、溫體制日漸穩定運作，未來江澤民權力基礎將進一步受壓縮（本

會資料，2003.5)。

胡、溫塑造親民、務實、儉約施政風格，爭取民心

在施政特質上，胡、溫致力塑造負責、親民、務實、改革形象，藉此擴大政治影響力。3月28日政治局會議通過「關於進一步改進會議和領導同志活動新聞報導的意見」(改革以高層官員大小排位而不以新聞價值為排位之陋習)。旨在促進和帶動幹部思想、工作和領導作風，密切黨和群眾聯繫。胡錦濤指出新聞單位應堅持正確輿論導向，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即「三貼近」思想)。提出「少報官，多報民，把鏡頭對準基層，把版面讓給群眾」(香港信報，2003.6.6)。會議同時通過「關於中央政治局同志出國訪問的規定」(簡化國家領導人出訪規格)，要求政治局成員出訪應本「務實、精幹、節約」原則，減少人員，節約經費，簡化迎送儀式(新華社，2003.3.28)。整體而言輿論報導較前公開，如即日發布領導人巡視地方消息，即時發布山西等煤礦意外，甚至主動公布極為敏感之三六一潛艦遇難事件等，但仍在大陸當局的引導與控制中。

溫家寶風塵僕僕赴各地考察疫情、慰問醫務人員及患者之形象深入人心。渠將關注弱勢群體利益列為工作的重要議事日程。3月26日溫於國務院常務會議中，專門就進一步做好再就業和社會保障工作作出具體部署。3月底渠前往新疆地震災區視察，6月初前往東北關切煤礦礦區民眾生活。7月1日代表中共中央參加香港回歸6週年慶祝活動，親往探視淘大花園 SARS 受災戶，以溫和形象展現其親民愛民的政治承諾。渠對領導幹部作風提出「5個嚴禁」(嚴禁勞民傷財之形象及政績工程，嚴禁超編配備小汽車，嚴禁變相公費旅遊，嚴禁會議中贈禮品或紀念品，嚴禁向企業攤派會議經費)、「4個嚴格控制」(控制新建和裝修機關辦公樓，控制慶典和達標評比活動，控制出國[境]團組，控制會議文件以解決「文山會海」問題)、「4個堅決制止」(制止以公款互相宴請送禮，制止參加用公款支付之高消費娛樂活動，制止在公務活動中超標準接待，制止私自借用下級機關車輛)(香港文匯報，2003.6.29)。體現節制儉約精神，顯示整飭吏治的決心。

大陸當局並重視回應民意。廣州市3月17日發生大學畢業生孫志剛打工未辦暫住證，遭警方收押並虐死案。3位法學博士向「全國人大」遞交對「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法律審查之建議書，「全國人大」受理並啟動法律程序。此一運用法律手段，推動保護公民權利的法律變革產生了重大之政治後果(自由亞洲廣播電臺，2003.6.10)。6月18日國務院以極高效率廢除原法，代之「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救

助辦法」(各地公安不得以無暫住證為藉口，侵犯外地人人身自由)。此一迅速回應民意、從政為民的作法廣獲好評，胡、溫聲望再度上升(據悉大陸當局為因應盲流問題，本已著手改革相關法規，因孫案而順勢推出，把握機會爭取民心。Strategic Forecasting 網站。<http://www.stratfor.biz>)。

此外，中共中央已決定 7 月下旬至 8 月中旬不再赴北戴河召開會議，而改於北京舉行(香港經濟日報，2003.6.23)。一方面受 SARS 疫情衝擊，中共高層並藉以樹立親民、接近基層形象。

胡出任中央財經、外事、及對臺領導小組組長；跨足發表軍事觀點

胡在黨內領導地位進一步強化。5 月底以來陸續出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外事領導小組及對臺事務領導小組組長(CNN，2003.6.19)，逐漸掌握核心事務決策權。自「十六」大以來，其人事任命權加強(加強人事安排影響力)，逐步將己身人馬安插在重要的人事、黨紀及反貪腐職位上。多位團系人馬出任省級領導(當前北京官場流傳「中央江系掌權，地方團系接班」。與「十六大」前相較，團系擔任省委書記人數由 3 人增為 5 人，省長由 3 人增為 6 人)。4 月以來，更多具有共青團副局級以上職務歷練之幹部膺任新職(如南京市長羅志軍出任市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陳訓秋升任省委副書記、團中央書記處書記崔波升任寧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團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孫金龍出任浙江省委常委兼政法委書記、團中央書記處書記黃丹華出任國務院國資委紀委書記、中組部副部長沈躍(女)兼任人事部副部長等。本會資料，2003.6)。

5 月初胡、溫聯袂前往大連港，登上失事拖回港口的三六一號潛艇，探望罹難官兵家屬。胡籲請海軍記取教訓，江澤民亦發表長篇談話，指出潛艇失事反映出來的管理失誤和人為疏忽，必須嚴肅追究(香港明報，2003.6.28)。5 月 23 日中央政治局召開第五次集體學習會(主題為「世界新軍事變革的發展態勢」)，胡錦濤首度發表國防與軍事觀點，提出對新世紀建軍及軍事現代化改革的看法，倡議「跨越式發展」思路(以總書記身分表態。香港商報，2003.6.5)。據悉胡於會中強調需加強黨對軍的領導權，軍方應向政治局提出報告(The Straits Times，2003.6.18)。6 月上旬中共中央軍委發布命令，撤換海軍司令員及海軍政治委員(潛艦失事後之行政處置)。新華社報導該調動係「中共中央批准、中央軍委發布命令」，強調係經胡錦濤、江澤民一致同意，以化解「十六大」後槍指揮黨的疑慮。據悉江一開始不願嚴懲相關將領，惟胡堅持徹底調查，釐清責任(CNN，2003.6.19)。

胡成功出訪，奠立大國領袖地位

中共體認 SARS 危機對其國際形象之衝擊，盼在疫情初步掌控後逐步加強外事活動能量。5月下旬至6月上旬胡錦濤赴俄羅斯、哈薩克、蒙古進行國事訪問，係渠擔任國家主席後之第一次外訪。胡參加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峰會，聖彼得堡建城 300 週年紀念典禮。6月1日出席在法國艾維安舉行的南北領導人非正式領袖會議(八大工業國峰會[G8]之外圍會議)，倡議多邊合作，促進共同發展，展現「開放、透明、誠信、合作」形象與「務實」風貌，走出原本偏重第三世界的外交路線。同日與美國總統布希舉行美中高峯會時，布希稱讚胡在處理 SARS 上表現卓越領導能力，具透明度(新華社稿改成布希稱讚大陸政府，並刪掉「具透明度」字眼。香港蘋果日報，2003.6.3)。

二、掀起學習「三個代表」新高潮，江影響力延續，胡穩健順應新一波學習運動之內涵

中央政治局於 4 月 28 日召開會議，揭示當前政經工作方向，決定於黨內進一步開展學習貫徹「三個代表」思想工作。SARS 疫情結束後，「三個代表」思想(黨必須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重新列為官方政務之首，係「十六大」後新一輪的大規模政治運動。一般認為「十六大」已確立「三個代表」思想綱領地位，此時重燃學習高峰，江構思藉以延續影響力，胡亦順勢推動，借力使力，尋求在與江繼續磨合中逐漸貫徹己身理念。全國各地學習活動如火如荼進行。6月間中共中央(中宣部主導)兩度發出「學習貫徹『三個代表』思想新高潮通知」，要求各級黨委「認真研讀江澤民同志論三個代表、論黨的建設、江澤民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專題摘編)等一系列重要著作」(新華社，2003.6.22。中國時報，2003.6.24，A13 版)。

6月上旬中共中央出版「『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學習綱要」(據稱首週發行人數突破 300 萬冊。新華社，2003.6.17)，並於 6 月 10 日召開座談會(新華社，2003.6.10)。該綱要以全面宏觀角度，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路線、發展道路、發展階段和發展戰略、改革開放、根本任務、根本目的等方面，及經濟、政治、文化、國防和軍隊、統一戰線、祖國統一、外交和國際戰略、黨的建設等領域，全面闡釋「三個代表」。人民日報隨即於 6 月 11 日發表「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學習貫徹引向深入」社論。指出當前堅持防治非典(SARS)和促進發展兩手抓，是貫徹「三個代表」的必然

要求。6月23日人民日報社論要求全黨在學習「三個代表」時，要緊密團結在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周圍(新華社，2003.6.22)。

新一波學習主體除縣(處)級以上的領導幹部，亦包括大學生，期能達到「三進」的目標——進課堂、進教材、進頭腦(下學期將全面使用新編之「三個代表」教材，嘗試摒棄傳統說教方式，而以探討方式突出大學生關切問題)(大公報，2003.7.3)。

胡錦濤「七一」講話闡釋「三個代表」，高舉重視民意

7月1日係中共建黨82週年，胡錦濤於「學習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發表講話(1萬5千字。會議組織、層級規模空前，含括黨政軍所有領導，計800餘人出席)。渠指出「三個代表」是新世紀新階段全黨全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根本指針，重要思想本質係「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江澤民於兩年前建黨80週年指出「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同一切剝削階級政黨的根本區別」)，須落實到「黨和國家制定和實施方針政策的工作中去、各級領導幹部之思想和行動中去、關心群眾生產生活的工作中去」(新華社，2003.7.1)。

胡之講話全篇架構緊扣「三個代表」，以其謹慎低調個性，及仍在建構權力基礎過程中，深知此時仍需尊江、挺江。惟外界注意到胡定義「三個代表」的方式與江有所差異(The New York Times, 2003.7.2)。渠高舉民眾、重視民情，以「一切為民」進一步詮釋「三個代表」的真意。包括：1.重申「三個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被外界譽為「新三民主義」)；2.提出「群眾利益無小事」；3.凡涉及群眾切身利益及實際困難之事，再小也要竭盡全力去辦，特別是下崗職工、農村貧困人口、城市貧困居民的問題；4.實現人民的願望、滿足人民的需求、維護人民的利益，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發點及落腳點；5.不斷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全部奮鬥的最高目的；6.三個代表是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其「本」、「基」、「源」即為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7.人心向背是決定一個黨、一個政權盛衰的根本因素；8.堅持用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來衡量我們的一切決策(新華社，2003.7.1)。

三、醞釀政治體制改革，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

「政改」偏向行政改革，反腐廉政力度加大

中共高層面臨政治改革壓力日漸升高，其「政改」係著眼於排除經濟發展所

面臨的「體制性障礙」，以建立廉潔、高效的黨政組織。迄今大陸當局相關行動，皆依照「十六大」政治報告中「推動政治文明」的口號行事。「十六大」報告之「政改」部分篇幅頗長，許多要項實則屬於行政改革範疇，與外界認知之民主改革有相當差距。近數月來相關進展包括：

1.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民主制度方面：4月間溫家寶與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人士座談時，指出將更加重視彼等之重要作用。包括：建立重要情況通報和重大決策諮詢制度；請這些人士每年擇一兩個經濟和社會發展之重大問題，開展考察調研；「國務院」及各部門要真誠接受這些人士監督，虛心聽取批評意見；「國務院」及各部門要為這些人士建言創造有利條件。國務院已將上述內涵納入新修訂的「國務院工作規則」中，期能加強民主監督(新華社，2003.4.11)。

2.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方面：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自3月間啟動。新設「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商務部」、「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均已掛牌運作。各部門「三定」方案(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近期通過實施(期間一度受SARS影響，進度稍慢。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網站，2003.6)。另地方機構改革逐步啟動(包括設立省、市兩級政府國有資產機構；各省市參照國務院，因地制宜推進機構改革和職能重整。本會資料，2003.7)。

溫家寶指出此次機構改革的「開起航」，就是要「揚起轉變政府職能的新風帆」，「駛向服務型政府的海洋」，切實把政府職能轉變到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上來。從根本上告別政府權力過於集中、政企不分等積弊(韋章堯，「溫家寶的均衡小康與機構改革新論」，鏡報月刊，2003.5，頁.31-33)。

3.司法體制改革方面：最高人民檢察院6月間召開「高檢院機關司法體制改革研討會」。檢察長賈春旺提出當前要研究4點改革：明確法律監督的內容和範圍，理順檢察機關與其他政治和紀檢監察機關在工作中的關係；從制度上保證依法獨立公正行使檢察權；完善檢察環節的訴訟程序、工作機制和監督制約機制，拓寬接受「人大」和社會監督的渠道；改革檢察隊伍的管理方式，依「檢察官法」推進隊伍專業化建設(本會資料，2003.6)。最高人民法院6月26日要求各地法院工作人員展開3個月的「公正與效率」司法大檢查。包括指導思想是否正確，審判作風是否端正，審判質量和效率是否提高。檢查有無法官法規定之「13種不得有」之行為(中新社，2003.6.26)。

4. **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瞭望週刊披露，大陸當局將以公務員制度(加強法制建設，「公務員法」草案在徵求意見階段、完善考試錄用制、規範競爭上崗、推動考核和分類管理)；事業單位人事制度(以推行聘用制和崗位管理為重點、分類推進改革、加快制定配套措施)、工資福利制度(工資水準增長科學化及制度化、妥善處理地區行業及人員間工資關係、逐步規範工資分配秩序)等「3項制度」為重點，深化幹部人事制度改革(本會資料，2003.2)。

5. **加強對權力的制約和監督方面**：深圳市於今年上半年進行「行政三分制」試點。調整若干政府部門，設決策局(無執行權)、執行局(無決策權)及監察局(此和審計局作為監督部門，直屬市長管轄)(新華社，2003.1.19)。根據深圳的探索，制約權力，一要加強領導班子內部的民主監督(出臺「市管單位領導集體決策重大問題議事規則」)，二要健全紀檢監察機關的監督機制；三要發揮「人大」「政協」的監督作用，四要加強審計監督，五要強化群眾監督，加強新聞輿論監督(香港信報，2003.5.30)。

中共「全國政務公開領導小組」於6月26日舉行第一次會議，中央書記處書記兼該小組組長何勇指出，目前鄉鎮級、縣級行政機關政務公開已上軌道，本年刻積極推動地市級機關政務公開，學校、醫院及其他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之公用事業單位亦要進行辦事公開制度(新華社，2003.6.26)。希望增加辦事透明度，保障民眾之知情權。據悉「全國人大」已起草政務公開法，後綜合各方意見，決定先由國務院制定「政務公開條例」(文匯報，2003.7.12)。

6. **反腐鬥爭方面**：反腐為中共新領導層為取信於民、奠定執政基礎所展開的第一個大動作。2月間中紀委全會確立了今後5年廉政反腐目標。胡錦濤表示「要把自己自覺地置於中紀委、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監督之下」(胡之堅決談話打破傳統政治框架，引起黨內衝擊。王健民，「胡溫體制反腐，權力要制約」，亞洲週刊，2003.4.7-13，頁20-21)。國務院於3月27日召開廉政工作會議，溫家寶強調反腐敗工作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為重大政治任務(本年5大工作部署：落實廉潔自律規定，規範從政行為；創新體制，從源頭防腐[包括深化行政審批、財政管理、國有資產及幹部人事制度改革]；糾正部門和行業不正之風，解決人民反映之突出問題；加大查案力度，嚴懲腐敗份子；嚴格依法行政，強化對行政權之制約和監督。新華社，2003.3.27)。中共高層認為領導幹部廉潔自律、查處大案、糾正部門和行業不正之風這3項工作，是反腐敗鬥爭經常化的重要手段。

中紀委及監察部6月25日召開紀檢監察機構負責人會議，中紀委書記吳官正要求逐步建立教育、制度、監督三者並重的預防和懲處腐敗體系(新華社，2003.6.26)。中紀委及組織部7月2日召開「巡視工作會議」，吳官正強調做好巡視工作是完善

黨內監督機制重大舉措，並能發揚民主，及時了解領導班子貫徹執行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民主集中制、選拔任用幹部規定和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情況。應能從制度上促進幹部廉潔自律，減少不正之風和腐敗(新華社，2003.7.2)。

中共中央刊物探討黨內民主

「十六大」政治報告中首度明確提出要以完善黨大會及委員會制度為重點(「擴大在市、縣進行黨的代表大會常任制的試點，積極探索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發揮代表作用的途徑和形式」)，**建立健全及反映黨員及組織意願的黨內民主制度**。外界認為「黨內民主」為中共進行民主改革之突破口，允許黨內選舉競爭亦有助於抑遏貪腐。實則黨內民主構想已提出年餘，在曾慶紅任中組部長時就曾積極研究，胡錦濤任中央黨校校長時亦責成所屬進行研析。「十六大」後「黨內民主」開始試行。去年12月6日至21日四川省雅安市(在雨城區和榮經縣)推行黨代會常任制試點，進行了中共黨史上第一次黨代表直接選舉(且規劃每年開一次黨代會，黨代表新增7項職權，期能對領導幹部進行制約和監督。2003年1月12日浙江省臺州市椒江區則由黨代表直接選舉黨委—椒江區委員會。唐立，「中共邁出黨內直選艱巨的一步」，前哨月刊，2003.4，頁22-23)。預期新領導層在維持社會穩定、經濟成長的前提下會審慎衡量具體方策推出之時機。

6月中旬中共中央委員會刊物求是雜誌發表「以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專文，引起矚目。該文指出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的挫折顯示，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是死路一條；不改革政治體制、不實行人民民主同樣是死路一條。以黨內民主推動人民民主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戰略選擇，重點包括：健全黨內各項民主制度—拓寬民主渠道、實行黨代表大會常任制、改革黨內選舉制，完善候選人產生和差額選舉辦法；建立健全有效的民主監督機制—黨內監督、群眾監督、法律監督、民主黨派監督；改革和完善黨的領導體制和工作機制—規範黨委、「人大」、政府、「政協」及人民團體的關係(甄小英、李清華，「以黨內民主推進人民民主」，求是半月刊，2003.6.16，pp.33-35)(西方傳媒認為此篇文章係「十六大」以來，中共最高權威理論刊物首度將「政改」及人民民主提高到共黨執政地位生死存亡的高度。德國之聲廣播電臺網站，2003.6.20。甚至被港媒預測為胡「七一」講話全面提出「政改」的前奏曲。香港太陽報，2003.6.19)。

中央黨校教授董德剛於官方瞭望雜誌撰文指出，中共未來在政治體制、治黨方針、執政方式的改革，都能在「三個代表」思想中找到理論基礎。在黨建方面，

「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透過發展黨內民主，帶動社會民主化(香港太陽報，2003.7.1)。

四、「人大」修憲工作啟動，「三個代表」、保護私產規劃明年入憲

2004年3月中共將進行第四次修憲(目前憲法係八二年頒布，歷經八八年、九三年、九九年3次修訂)，關乎未來黨政建設路線，政局穩定，黨與人民關係之維繫。大陸當局近期成立6人組成之中共中央修憲領導小組，組長為「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成員包括中宣部長劉雲山，國務院秘書長華建敏、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滄寧、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滕文生、社科院院長陳奎元。並邀集專家草擬修憲初步意見(參與部門包括中央辦公廳、「人大」法工委、社科院、中國政法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

大陸法學家分析此次修憲將以「十六大」政治報告為基礎，將「三個代表」、政治文明、人權保障及保護私有財產4方面寫入憲法修正案(文匯報，2003.6.8、2003.6.10)。此次修憲將係中共「政改」及「經改」的里程碑，可能改變共黨意識形態之結構。其中賦予私有企業與「國企」同等之法律保護，可視為中共建政以來最重要的憲政變革(Financial Times，2003.6.11)，工商聯等民主黨派及法律、經濟學界人士，已多次向中共中央提案建言。

睽諸去年底胡錦濤上任召開之第一次政治局學習會即以憲法為主題，渠提出要樹立憲法意識，維護憲法權威。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是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一項根本任務。分析家認為胡有意建立以憲法治國的框架(香港信報，2003.6.11)，對此次修憲勢將高度重視。另據悉目前正籌備於「人大」籌設「憲法委員會」，圖推動憲法真正成為國家政治、經濟及社會生活所必須遵循、並可依此進行司法及審查操作的根本大法。此被視為中共新領導層具創新意識的一項舉措(唐文成，「中共新領導層關注哪些發展難題？」，鏡報月刊，2003.3，頁30-32)。

大陸政情穩定的負面(不利)因素

一、高層角力隱現，江、胡「兩個中心」相互牽制

SARS 危機凸顯雙軌決策，軍方強力擁江

SARS 疫情蔓延時，胡、溫站在第一線抗疫，與江避居上海形成強烈對比。江

系人馬擔憂江權力被邊緣化，引發暗中角力，而黨、軍結構二元化矛盾及兩個領導中心的協調問題亦凸顯。胡、江決策雙軌制呈現不穩定態勢。解放軍最初拒絕公布 SARS 病例數據，胡、溫直至江首肯，方能將解放軍各醫院納入抗 SARS 體系中，江則要求官方傳媒顯著報導此事(該新聞立即躍居重要版面。The Straits Times, 2003.6.14)。江澤民直至 4 月 26 日對 SARS 表態，卻指出抗疫獲得明顯成效。江系人馬曾慶紅(4 月 24 日)、賈慶林(4 月 25 日)、黃菊(4 月 25 日)、吳邦國(4 月 26 日)、李長春(4 月 25 日)亦於同一時間發表調子不熱不冷的抗 SARS 談話。4 月 28 日防治 SARS 緊張時刻，中央政治局卻開會議討論「掀起學習三個代表的新高潮」，引發外界揣測。惟為維繫政權合法性，拉攏民心，亦體認目前並沒有不合作之空間(可謂競合或利益妥協關係)。其後胡、溫與江系人馬抗疫之口徑與步調逐漸一致。

分析家認為 4 月下旬胡錦濤撤換江嫡系人馬衛生部長張文康，也忍痛同意免去團系人馬北京市長孟學農職務，以求平衡。在接班人選的政治角力上，最後採妥協方式，由朱鎔基嫡系王祁山(原海南省委書記)出任北京市長兼市委副書記。5 月 30 日衛生部副部長高強替張文康瀆職行為辯護，遭批評後又於衛生部與 WHO 聯合記者會中(6 月 12 日)承認張係因處理 SARS 疫情失誤而下臺(自由亞洲之聲廣播電臺網站, 2003.6.13)。據稱 5 月底江澤民於久留上海重返北京時(適逢胡錦濤出訪)，曾對張親予安慰。有跡象顯示張文康可能重返官場(The Straits Times, 2003.6.13)。

軍方仍呈現強力擁江態勢。5 月底胡錦濤出訪之際，官方權威刊物求實發表了吹捧江澤民軍事戰略思想之文章。近月來江曝光頻仍，於玉泉山(中央軍委辦公機構所在)接見外賓，該處儼然成為第二個行政中心。6 月下旬北京 SARS 疫情「雙解除」之際，江適時露面，接見寮國人民革命黨中央主席及印度總理(香港太陽報, 2003.6.26)。胡「七一」講話後，中央軍委副主席郭伯雄要求全軍堅定對「三個代表」的「政治信仰」，「堅決聽從黨中央和江主席的指揮」，「堅持以江主席的國防和軍隊建設思想為指導」(香港太陽報, 2003.7.3)。

據傳宋平、喬石、萬里、谷牧等中共元老，6 月初曾致函中共中央，為「加速領導層的年輕化」與「有利黨政的平穩運作」，建議江澤民於今秋之十六屆三中全會卸去中共中央軍委主席職務(CNN 網站, 2003.6.16)。惟稍後明報訪問元老子女，均否認並駁斥。並結合非江嫡系人馬，醞釀施壓。同時元老們鑒於黨權及軍權由不同人掌握將加劇權力鬥爭，故不斷建議胡積極插手軍隊事務(中國時報, 2003.7.1, A13 版)。

江澤民親信曾慶紅於政治局常委中實質權力僅次胡錦濤，「兩會」時出任國家副主席。在解放軍高級將領的人事年輕化過程中，據悉年初乙批與曾慶紅關係密切的將領獲得提陞(其中不少高幹子弟)，渠對軍隊人事之插手，主要透過總政治部主任徐才厚進行(田平，「江澤民續任軍委主席垂槍聽政」，前哨月刊，2003.4，頁 19-21)。惟曾之權力亦遭牽制。據悉 5 月下旬胡錦濤出訪時，江澤民另一親信曾試圖建議由曾慶紅主持一次既定的政治局會議，然遭其他政治局成員反對而未果(Reuters, 2003.6.29)。此外，嫻熟臺灣事務的曾慶紅令人意外地未成為中央對臺領導小組成員。另據傳江系另以防範流行疫病可能對社會帶來安全威脅為由，建立應緊急籌設類似國安機構之「危機管理委員會」。胡以缺乏具體計畫內容為由，不列入議程(中國時報，2003.6.22，A4 版)。

胡未如預期宣示民主改革；審慎處理上海首富重大犯罪案

胡錦濤處理 SARS 之興革動作超出預期，使外界對政治民主進展空間產生更大期待。自 6 月上旬起，海外媒體(英國泰晤士報[Times, 2003.6.9] 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2003.6.13] 等)開始傳出胡可能在「七一」講話中作出「黨內民主」重要政策宣示(容許黨內中層職位選舉與開放競爭，地方「人大」代表也可提名省、市長候選人等)，預料將踏出自「六四」以來最重要的「政改」步伐。並引述北京高層消息人士指稱，講話草稿內容已在黨政機構間流傳。

惟「七一」講話未如預期，並無「政改」相關論述。英國每日電訊報引述消息人士說法，指稱胡講話草稿事先洩漏，引起江系震驚，胡被迫刪除這些敏感內容，以免被錯誤解讀(Daily Telegram，2003.7.2)。華盛頓郵報指出在江系人馬牽制下，胡並無條件推動大膽之「政改」方策(Washington Post，2003.7.1)。華爾街日報指出，此結果凸顯胡可操作空間太小，破壞己身建立起來的當家形象，渠想擺脫江陰影，樹立己身支持班底，進展實在有限。江在各職位要津牽制胡改革勢力的黨羽，則找到新能量(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2003.7.2)。紐約時報則稱中共領導「最首要的政治責任」是推動三個代表。需數年才能建立對深層「政改」內涵的共識(The New York Times，2003.7.2)。

另一方面，中共高層偵辦上海首富周正毅案力度加大。相關調查實已進行年餘(「十六大」前即由中紀委書記尉健行負責)。該案表面上涉及經濟犯罪，實則包括上海官員貪瀆，涉案人數及層級愈來愈廣(一些低階官員已遭逮捕，盛傳有當前中央極高層人士可能涉案)，外界解

讀為胡錦濤藉機對上海幫進行整頓。據悉由溫家寶親自擔任專案組長(自由亞洲廣播之聲, 2003.6.19), 胡並指派中紀委書記吳官正派遣 200 人之調查工作小組進駐上海, 繞過曾慶紅之姻親公安部長周永康(The Straits Times, 2003.6.20)。該案之後續發展及可能之政治效應, 頗值觀察。

二、SARS 危機暴露體制弊端, 大陸學界湧現批評、期許聲浪

SARS 凸顯中共行政效率、醫療資源及透明訊息之脆弱, 國際形象受損

SARS 疫情在大陸當局警覺事態嚴重, 採取斷然措施後目前暫告緩解。惟因 SARS 造成集體普遍憂懼之特性, 整個處理過程暴露出體制缺陷、官僚習性與信息封鎖問題, 造成民心動搖, 國際信用度下降, 對大陸當局未來施政及與民眾互動皆有深遠影響。SARS 對中共領導人如當頭棒喝, 凸顯問題, 也暗含機遇, 胡、溫經此一役, 如何妥善處理「發展、改革、穩定」三者關係, 為嚴峻挑戰。

SARS 引發的問題包括: 1. 幹群關係進一步疏離。新政府及黨的權威及領導能力受損。民眾對政府所謂疫情有效控制之說詞不相信, 質疑黨能否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2. 醫療體系的疏漏。包括公共衛生體系被侵蝕, 中央政府資源不足, 不允許非政府社會訓練組織幫忙填補漏洞(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2003.5.6)。3. 官僚體制的拖累。大陸當局在爆發 SARS 疫情後歷經隱瞞、掩飾、進退失據到昭告真相, 暴露出官僚顛覆與箝制資訊(The New York Times, 2003.5.19)。而某些公眾服務機構配置不合理, 層層行政審批複雜化, 中央地方欠缺協調, 亦影響政府統合抗疫行動。4. 危機處理體制的欠缺。大陸當局應對突發事件遲緩, 疫情報告之資訊化網路不健全。難以在第一時間採取迅速有效之反制舉措 5. 兩極分化的徵兆。正是老一套反應機制導致疫情大規模發展, 在巨大的國際壓力下才終能克服。所暴露出的行政和政治缺陷無法用其他方面的成就彌補。應把 SARS 危機看成大陸發展過程中更為危險的兩極分化之徵兆(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2003.5.15)。6. 對外形象的受損。中共苦心經營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中國機遇論」大打折扣。

SARS 彰顯的機遇包括: 1. 人民對增加政府施政透明、放寬信息管制等改革出現預期, 盼實現更大程度的新聞自由和社會對政府的監督。官方報刊呼籲信息鬆綁, 人民「知的權力」, 保障人民知情權成為話題。2. SARS 防治過程刺激中共領導人反省, 體認到為鞏固政權, 決策須更貼近人民, 回應人民的需求, 政府運作

模式及工作作風亦須因應調整。對學者的相關建言亦較有理解的空間。3.對責任政治預期增加，行政及幹部改革制度將升溫。大批官員因抗疫不力遭撤職，反腐行動升高。4.半官方基層組織崛起。屬地方層次之半官方組織「街坊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全力配合，彌補官方抗疫之左支右絀。5.中共在處理 SARS 問題上終能控制局面，反映出其體制仍具有一定的適應能力，同時可能促使其未來在處理經濟和金融數字上，更具有透明度(摩根史丹利全球首席經濟師史蒂芬·羅奇[Stephen Roach]，2003.5)。6.對發展路線的反思。大陸 20 餘年來以經濟建設為最高任務，發展過程中犧牲其他領域(如公衛、環保等)之平衡，未來應將注意其他發展指標之協調。7.國際輿論形成有效外部壓力。胡、溫後來決定公開疫情實況，顯示國際輿論壓力已漸能對大陸內部政策產生影響力。

體制內外學者要求信息透明、輿論監督，「政改」呼聲升高

愈來愈多大陸學者(包括隸屬社會院、國家行政學院等體制內智囊機構者)勇於批評政府管理體制之弱點，期許政治改革、輿論監督與社會開放。SARS 疫情以來，黨軍關係、中央與地方關係、黨對媒體控制、黨政關係與責任政治等政治體制問題浮上檯面。許多學者公開探討「政改」的迫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新聞自由、監督機制、決策民主化等議題。「十六大」及政府換屆後，政治言論環境稍微鬆綁，當前學者建言之「政治小陽春」似又重啟(請詳表 1，SARS 危機期間大陸學者對體制建言一覽表)。

於這段時間倡言高論的自由派學者中，以曹思源之主張最為大膽(素有「曹大膽」之稱)。渠指出目前國家主席是虛位元首，應在較短時間內實行民選總統制(直選或間接選舉，需競選，兩名候選人可能皆為黨員，不致引起太大政治震動)，以根本上解決「黨政不分」問題，從制度上保證國家行政權行使的高效，並與立法、司法權間形成更有效的制衡。要實行總統制，必須進行修憲(聯合報，2003.6.2，A13 版)。

曹思源主持的「北京思源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和青島大學法學院於 6 月 19 日舉行「民間修憲青島論壇」研討會(40 多名學者出席，包括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全國人大」亦派員出席)，建議取消「專政」條款、人權入憲、建立憲法法院和實行總統制等。議題尖銳，與會者暢所欲言，相關建議將提交「全國人大」和中共中央修憲領導小組(星島日報，2003.6.24；明報，2003.6.30)。

三、傳媒傾向自由報導，大陸當局加強管制，另進行「新聞改革」 中共定位輿論宣傳角色呈現鬆緊兩種態勢，多家報刊遭整頓

4 月間隨著大陸當局逐日公布 SARS 疫情，及民眾對資訊透明化的渴望，大陸傳媒亦受到鼓舞，報導一度呈現多年來罕見的開放自由。但隨著疫情趨緩，及大陸當局逐漸開展的管控手段，報導尺度也逐漸緊縮。紐約時報指出，近來中共對傳媒控管領域呈現不尋常的不穩定情勢，一些作為寬鬆，一些緊縮，兩股力量持續拉扯(The New York Times，2003.7.2)。

政治局常委李長春(中央精神文明委主任)5 月 1、16 日於求是雜誌發表專文，全面闡述胡錦濤針對思想文化、新聞輿論戰線工作之「三貼近」思想，指出其具有「豐富的內涵」(指出要堅決整治有償新聞、虛假報導、有害訊息、不良廣告)。李並要求建立重大突發新聞報導反應機制(香港太陽報，2003.5.22、2003.5.28)。胡認為要多報導百姓關心之事，經濟社會健康題材，少報領導人之官話。此一原則已獲李長春表態支持。然劉雲山(亦屬團系)掌控之中宣部認為須突出黨及領導人之威信，避免境外敵對勢力破壞(Washington Post，2003.7.1)。實則中共領導人即或願鬆開部分報導限制，仍明瞭底線為不能影響情勢穩定(明報新聞網，2003.6.24)。

從實務層面觀之，近來傳媒管控日漸緊縮。據統計今年 3 至 6 月以來，大陸當局已對近 30 家平面媒體進行管控，手段包括停刊、停止發行、撤換或檢討媒體領導班子、點名批評、加強監控、下令不得炒作敏感話題(本會資料，2003.7)。例如 3 月「兩會」期間，關閉經常評論黨內人事和改革措施之廿一世紀環球報導(屬南方日報旗下，4 月間復刊，管理階層遭撤換)。一向言論犀利之南方週末因大幅報導朱鎔基，集團人事遭大幅調整。北京新報6 月初因刊登批評官場惡行之「中國 7 大噁心」，被視為詆毀國家制度及權力機關，被撤銷刊號並停止出版，編輯部人員決定解散。財經雜誌 6 月 20 日大幅報導周正毅案，討論 SARS 對大陸的影響，刊登學者探討媒體改革及政治改革專文，該期被暫時停止發行(中國時報，2003.6.24，A13 版)。6 月下旬中宣部召開新聞出版通氣會，點名批評 10 多家違反新聞紀律的媒體。並要求媒體不要炒作下列敏感問題：SARS、上海周正毅案、廣州孫志剛案、楊斌案、軍醫蔣彥永寫信事件、潛艦失事事件、北韓核武問題(法國廣播電臺，2003.6.25)。大陸熱門電視劇「走向共和」日前亦遭中宣部禁止重播(該劇內容敘述清朝過渡至民國期間，政治家主張民主，為民謀福等情節。江迅，「中共政治改革，電視劇打先鋒」，亞洲週刊，2003.6.23-29，頁 24-27)。SARS 流行期間，大陸當局

在 5 月上旬一週內逮捕 107 名藉手機傳遞「謠言」的民眾，訊息管制伸向一般民眾(WHO 駐北京主管指出許多所謂謠言事後都證明是正確的。Washington Post, 2003.5.13)。

洛杉磯時報指出，SARS 危機後之新聞緊縮讓外界清楚看見中共高層訊息透明化的限度(Los Angeles Times, 2003.6.16)。華盛頓郵報則指出，大陸資訊日益流通，互聯網蓬勃發展，記者及編輯急於挑戰政府尺度，前述壓制行動的最終成效，令人質疑(Washington Post, 2003.6.19)。

大規模新聞出版管理制度改革浮現

3 月「兩會」後迄今，大陸當局逐漸醞釀系列新聞出版管理變革。包括建立出版法人制度、改革資產管理制及自身運作方式、逐步開放書報刊零售市場、新聞聯播全面改革方案等。5 月 1 日第一個 24 小時的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開播(標榜「更多、更快、更全面」。美聯社, 2003.5.1)。6 月下旬中宣部、新聞出版署及國家郵政總局決定，報紙期刊之出版單位至 2003 年 9 月底(科技期刊除外)暫停 2004 年度之徵訂攤派活動(即機關強制訂報。此係依據胡錦濤於 2 月於中組部會議之指示，4 月間中宣部調查攤派問題，發現問題嚴重。星島日報, 2003.6.17)。其立即結果為上千家隸屬於各級黨政機關的小報將被迫關門。7 月初召開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後，6 家試點報業被要求儘速提出報紙市場化改革方案(另已有出版界、電視臺、期刊雜誌及廣電集團的試點，共有 30 多家。李長春前於視察深圳特區報時明確表示，須客觀承認「報業是產業」。星島日報, 2003.7.5)。

另據悉宣傳部門將在 9 月前整頓國家新聞機關結構，淘汰黨及機關報，財務、人員、發行與行政職能進行「三脫鉤」(國家機關及黨組織一律不再辦報)。保留「三報一刊」(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經濟日報、求是雜誌)，各省市自治區僅保留一份單位機關報，其他一律轉由政府監管的法人團體管理(聯合報, 2003.6.26, A13 版)。日後主管單位只管理社長、總編輯等高層幹部，實施政治領導，不干預報刊具體操作。政府功能由「辦報」向「管報」方向轉變(大公報, 2003.7.3)。更有學者及媒體業者指出，大陸當局未來可能允許部分外資及大陸私人企業投資媒體，然股權不能超過 40%(Susan V. Lawrence, "Squeezing Profits From Propaganda,"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003.7.10, pp.28-31)。

北京學者認為，大陸當局所謂「新聞改革」，實乃著眼於加入 WTO 後市場化競爭的需求，以持續透過更有效率的方式(如股權控制、編輯控制)掌控生存下來的媒體，確保續扮演國家宣傳機器的角色(中央社, 2003.7.6)。至於如何既要求媒體自謀生路，又

要求成為「黨的喉舌」，具體方案尚在討論中。惟這波改革亦將提高資訊配置的合理性和敏感性，提高報刊質量，對整體報業發展具深遠影響。

四、「六四」14週年，異議份子空間緊縮

大陸當局壓制異議人士之手腕未曾放鬆，隨著近年來中堅份子(特別是「中國民主黨」之籌建者)紛遭判刑繫獄，異議人士失去串連動力，活動有限而零星。知識分子亦擔憂在互聯網上之言論尺度，可能遭當局構陷。5月間當各界焦點置於SARS疫情之際，大陸當局採取集中行動加緊鎮壓異議人士，將許多積壓之舊案一併清理、判刑。

5月9日遼陽工運(2002年3月發生)領袖姚福信和蕭雲良以顛覆國家政權罪分別被判處7年及4年，6月底其上訴遭駁回(英國BBC廣播電臺網站，2003.6.28)。5月9日成都法院以顛覆罪判處知名之「天網」網站創辦人黃琦(女)監禁5年。5月28日北京中級法院以顛覆罪判處4名知識分子(徐衛[新聞工作者]、靳海科[地質工程師]、楊子力[電腦工程師]、張宏海[自由撰稿人])監禁8至10年。彼等於2000年5月成立「新青年協會」，將政治及社會制度改革文章刊登於互聯網上，2001年3月遭拘捕(英國BBC廣播電臺網站，2003.5.29)。

「六四」14週年前夕，「天安門母親」團體(「六四受難者家屬組成」)發出公開信，指出「六四」事件與SARS事件如出一轍，皆因不重視人民生命的制度所造成。要求胡錦濤重新評價「六四」。把處理SARS的巨大努力作為轉捩點，努力喚醒人民，給予知情權，建立一個公正公平的社會，真正開始政治改革(美國之音廣播電臺，2003.5.30)。

表一：SARS 危機期間(2003年5至6月)大陸學者對體制建言一覽表

<p>●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易憲容(於北京經濟觀察報撰文)： 此次 SARS 危機向大陸及世人發出明確訊號：以往政治體制已不適應發展了的經濟情勢，政治體制改革已迫在眉睫，第一步就是讓政府官員為己身行為承擔責任，民眾進行有效監督。以建立一個有效與有限的政府，一個受法治、公民社會與民主約束的政府(中國時報，2003.5.4，A10版)。</p>
<p>●社科院社會研究所研究員陸學藝： SARS 讓政府學到一個教訓，就是「問題是堵不住的」，政府須將知的權利還給民眾，才有助促進政府決策的透明化、民主化(臺灣新聞報，2003.5.10，5版)。</p>
<p>●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杜綱建： SARS 暴露大陸政府管理體制的弱點，究係以中央部委系統或是地方政府為主。廣東開始的 SARS 就因中央與地方缺乏協調統一，以致延誤擴散，造成全國性危機。此外亦突出部門間利益糾紛不能協調、資訊作假隱瞞、政府公信力嚴重受損，即大陸政治體制中的最大弊端「官本位負責制」(各級官員只在意己身官位。臺灣新聞報，2003.5.10，5版)。</p>
<p>●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負責人仲大軍： SARS 危機過後，各界對政治結構會有一場大的重新思考，高層領導人如今知道民眾如此要求，不管他們願不願意(重新思考)並不重要。渠另於網站發表評論，批評政府效率低、專家水平不夠、大陸媒體受政府嚴密控制、唯 GDP 至上。政府應重視其他社會發展指標，特別是政治文明指標和新聞自由，建立一個社會批評和監督機制(中國時報，2003.5.2，A6版)。</p>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專家胡鞍綱：**

SARS 事件是對對新屆政府首次突發的外部衝擊與重大挑戰，也是對中共執政和危機處理的一次檢驗。顯示出行政管理體制的弊端：信息不透明、權限劃分不清、監督機制不到位、欠缺主動應變能力等。在國際方面建議加大對外傳播信息能力，歡迎國際輿論監督，主動進行國際公關，重塑大陸政府形象(本會資料，2003.5)。

●**經濟學者吳敬璉：**

中共內部仍有高官堅持「信息不公開是保持社會穩定和國家形象的好辦法」，是嚴重錯誤。此事要從傳媒體制、政務公開等制度上解決，需有自由的新聞傳播。SARS 危機實際上是一次社會治理的危機，疫情過後要不失時機地推進政治和社會體制之改革，建設「公開、透明和可問則的服務型政府。」(新加坡聯合早報，2003.6.23)。

●**自由派學者仲大軍(接受中國時報專訪)：**

SARS 暴露的政治弊端，讓大家更迫切覺得改革有其必要性。當前大陸最大的問題是新聞管制，應考慮新聞立法。未來政府信息透明度要更公開。而新一屆領導人不能掌握軍權，權力不完整，導致危急情況發生時，不能及時了解情況和指揮軍隊等，須從政治科學的角度來考慮大陸政治體制的科學性(中國時報，2003.6.14，A13 版)。

●**人民日報前副總編輯周瑞金(於財經雜誌發表「推動信息公開，媒體責任重大」專文)：**

SARS 危機暴露了大陸媒體普遍患有「失語症」與「失真症」。媒體應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積極主動突破信息封鎖，同無理的行政干預進行必要的抗爭。應在政府與媒體間建立「體現現代社會特徵的亦師亦友的新型關係」(新加坡聯合早報，2003.6.23)。

●**「政協」委員，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白綱：**

SARS 事件對未來政治改革之影響不可低估，憲法在保障公民相關權利，尤其是知情權方面不夠完善，明年修憲時有望修正相關條款，解決言論壅滯和新聞失真等問題，並將憲政改革提上議事日程(文匯報，2003.5.17)。